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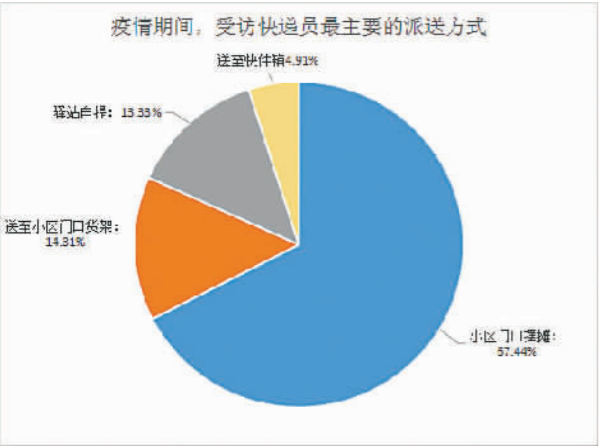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甘哲
E-mail:grbnmgzk@163.com

后疫情时期， 快递小哥喜欢怎样送快递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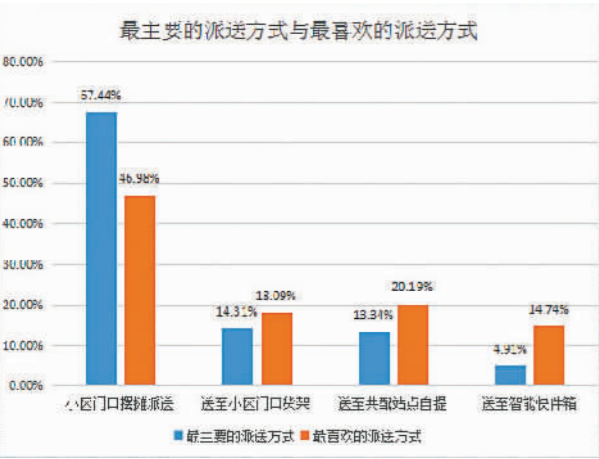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讯（记者甘哲）4月7日，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《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提出要“完善物流快递业相关防控措施，允许快递人员进入社区（村）配送”。这是对疫情防控期间消费者和快递配送员反映强烈的“进小区难”问题的积极回应。当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“后疫情时期”，快递员该如何送快递？国家邮政局联合快递杂志展开了调查。

调查通过将问卷二维码直接发放到邮政、“通达百”系、顺丰、京东物流、苏宁物流及其他品牌的快递从业者，共获得有效问卷1852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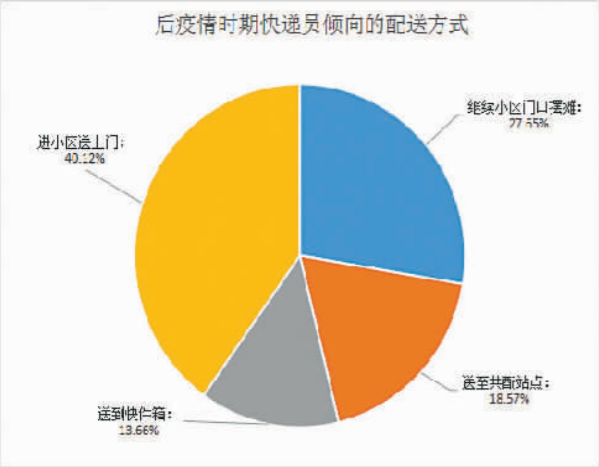
疫情防控期间，快递员最主要的派送方式是什么？记者在问卷中设置了“小区门口摆地摊派送”“送至小区门口货架”“送至驿站或便利店等共配站自提”和“送至智能快件箱”4个选项。调查发现，有265人（14.31%）选择了“送至小区门口货架”，91人（4.91%）选择“送至智能快件箱”，即“无接触配送”所占的比例不足20%。选择“小区门口摆摊派送”的多达1249人（67.44%），占比接近七成（详见下图）。



为了解一线快递员更倾向于用什么方式完成末端快件投递，记者设置了疫情防控期间快递员“最主要的派送方式”和“最喜欢的派送方式”两个问题。对比发现，虽然有1249人选择“小区门口摆摊派送”是最主要的派送方式，所占比例高达67.44%，但只有870人选择这是他们“最喜欢的派送方式”，所占比例下降了20.46%，至46.98%（详见下图）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一线快递员“最常用”的配送方式未必就是他们“最喜欢”的方式。



那么，在后疫情时期，快递末端交付方式会发生哪些变化，快递小哥又更倾向于如何投递快件？调查数据显示，传统的“进小区送上门”仍是多数快递员的首选，占比超过四成；但令人稍感意外的是，27.63%的受访快递员仍希望延续疫情防控期间在小区门口摆摊派送的方式；选择希望“送到驿站或便利店等共配站”和“送至智能快件箱”的分别占比18.57%和13.66%（详见下图）。



而在对部分消费者的调查中，40.79%的受访者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够“恢复常态，快递员配送上门”；27.63%的受访者希望继续保持“无接触”投递方式，送至驿站或自提点；11.84%的受访者希望投递到智能快件箱；另有19.74%的受访者则表示希望“投递前先电话商定投递方式”。由此可见，在后疫情时期，消费者对快递配送方式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化，这也对快递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（制图：甘哲）

阅 读 提 示

5月6日，成都小学低年级学生开学。当日，记者探访了一所大部分学生来自进城务工家庭的学校，了解打工子弟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开学故事。随着“神兽”归位，此前在家没有网络上网课、与父母不在一起不方便完成作业等难题逐渐解决，现在打工子弟开始面临新的生活：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……

本报记者 李娜

间隔1米排队，洗手消毒，在帐篷内经过热成像检测、体温枪检测，提交家庭健康码、家长承诺书以及填写信息筛查表后，才能跨入校门——5月6日清晨7点45分左右，位于成都高新区新雅街6号的庆安小学门前，数百名低年级学生按流程依次入学复课，隔离线外的家长们目送孩子进入校门后才如释重负离去。

“‘神兽’终于归位了！”5月6日，成都近71万名小学1至4年级学生正式返校，至此成都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开学复课。而这对于地处城中村、全校800名学生中有52.7%来自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庆安小学来说，意义非凡。

“神兽”归位

刘家豪是在爷爷的陪伴下回到学校的。“五一”节前，因现居住地与庆安小学同城不同区，父亲刘超提前将孩子送到其爷爷身边，他和妻子工作时间安排得实在太紧凑，必须让孩子提前适应开学后的生活节奏。

“工地上的活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，也是没有办法。”刘超现在在中建四司四川分公司成都一建设项目的保温班组工作，谈及儿子疫情期间的课业内容，刘超为自己的“一问三不知”有些惭愧，“这些主要是他妈妈在负责，我确实不太懂”。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刘家豪爷爷奶奶平日里还有农活要忙，除了照顾他的早晚饭和接

送问题，其他学习上的事情，两位老人根本插不上手。不过在刘超看来，只有学校和老师，才是孩子学习的真正“救星”。

“不能和同学距离过近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摘下口罩，饭前饭后要洗手……”开学当日，直至儿子鲜佳奇临进入校门的最后一秒，陈芳（化名）将连日来已经不知说了多少次的注意事项又向儿子重复了一遍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上班的时间越来越临近，她不得已转身快步离开。

“孩子回学校了，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终于解脱了！”陈芳与丈夫鲜强（化名）一家来自四川广元苍溪县，目前陈芳在成都有一份会计工作，鲜强则做电子设备方面的小生意。疫情以来，他们没有办法将孩子送回老家父母身边，夫妻俩春节复工后，腾不出时间顾及儿子的课业，鲜佳奇便每天在家里的电视上学习网课，用手机提交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。

“现在孩子学习的内容，和我们当年大不相同，有时候难住孩子的问题，我也一头雾水。”陈芳直呼因疫情无法开学的那段时间里，她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任孩子的学习，“每天下班后检查一遍老师批改过的作业，督促孩子把错的内容强化一下，其他时间只能完全靠他的自觉。”说起这些，陈芳一肚子苦水。

家校接力

刘家豪、鲜佳奇仅是庆安小学过半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一个缩影，该校在开学前实际面临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得多。

“手机、电视、网络，并不是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够拥有的网课条件。”庆安小学德育主任陈瑶告诉记者，该校在2月中旬启动了对全校800余名学生家庭情况的摸排，“一开始情况很不乐观，至少10%的家庭不具备上网课的条件”。

“不仅仅是硬件条件的局限性，家校的配合成为最大难点。”陈瑶称，在他们首轮摸底后，便以班级为单位，由班主任一对一通知到每一个学生家长，请他们为学生网课做相关准备，“往往手机有了，网络连上了，人却找不到了！”

下载的学习平台不会使用，作业不能正常提交；孩子与家长分隔两地，通知到了学生



学生正在进入校门。 本报记者 李娜 摄

家长，孩子却无法第一时间获取；没有爸妈在身边守着，爷爷奶奶对孩子的学习束手无策……陈瑶称，这一系列问题都让家校对孩子疫情期间的学习照管接力变得艰难。

“五六年级的学生独立自主性强一些，低年级学生的情况更加突出。”庆安小学办公室主任李莉娟既有行政责任，又身兼低年级几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，忆起复课未复学的那段居家上班时光，她直言“每天就像打仗一样”。

最令李莉娟头疼的就是学生作业的提交问题，“低年级学生年龄小，只能先通知父母，再由父母布置给学生，但经常会出现布置了五项作业，最终孩子只完成了两三项的情况”。

“4月28日的作业，到今天还有1人没有交上来。”李莉娟称，因父母下班时间不确定，网课期间的作业因学生们总是不能统一时间上传，批改工作经常会从下午持续到夜里十二点。

渴望回归

“一个人宅家学习有点久，总是感觉知识获取不那么深入全面，很想念学校课堂里的师生互动！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鲜佳奇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渴望，这种“归心似箭”的期待，在



5月6日，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沙雕大世界的工人在修护沙雕作品。近日，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沙雕大世界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，有序组织工人开始对沙雕作品进行养护修复等工作，为景区开放做准备。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

养护沙雕待客来

《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发布

随迁儿童上学升学难费用高问题更加突出

本报讯（记者赵剑影）近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《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调查》显示，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，比上年增加241万人，农民工规模继续扩大，省内流动继续增加。随迁儿童上学升学难、费用高问题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加突出。

外出农民工中，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9917万人，比上年增加245万人；跨省流动农民工7508万人，比上年减少86万人。除东北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比上年下降外，东部、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比都比上年略有提高。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增加最多，增量占到新增量一半以上。

从年龄结构上看，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.8岁，比上年提高0.6岁。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继续提高，该数据近五年来逐年提高。其中，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5.5岁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岁。

调查显示，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

为51%，比上年略有提高。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上年有所下降。其中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较上年下降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提升。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62元，比上年增加241元，增长6.5%。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制造业、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、住宿餐饮业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6大行业月均收入均稳定增长。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本地农民工。

与此同时，进城农民工的居住状况不断改善，人均居住面积继续提高，居住设施不断改善。随迁儿童教育情况也在不断改善，3-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继续提高；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.5%，有了进一步的提高；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3.4%在公办学校就读，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5.2%在公办学校就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随迁儿童上学升学难、费

用高问题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加突出。其中有50.9%的农民工反映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。

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，本地升学难、费用高所占比重较高；随迁子女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显。其中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。城市规模越大，升学、费用和高考问题越突出，在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些问题更加显著。进城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较上年均有提高。但城市规模越大，农民工对于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弱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难度越大。

此外，进城农民工参加各类组织活动更加积极，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13.4%，比上年提高3.6个百分点。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，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4.2%，比上年提高1.9个百分点。

工资怎么发、由谁支付补贴？ 百余名派遣农民工讨薪 律师三方调解妥善化解

本报讯（记者卢越）司法部4月23日发布第三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律师公益法律服务指导案例。案例中涉及一起百余名劳务派遣工人群体讨薪纠纷，该案在律师的调解下得以妥善化解，避免了矛盾升级激化。

2019年11月，浙江温岭某公司（以下简称温岭公司）与宁波某公司（以下简称宁波公司）签订劳务派遣协议，约定由宁波公司派遣工人到温岭公司，用工期限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。随后，宁波公司组织100多名四川籍农民工到温岭公司开展劳务活动。

4月初，温岭公司用工期限届满，宁波公司与派遣工人因工资发放和补贴支付问题产生纠纷，引发群体性讨薪事件。在当地温峤镇人民政府组织下，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陈丹琳律师、张婷律师参与了该案调解。

律师调解发现，双方对工人计时工资未达到基本工资的问题产生了争议。宁波公司与派遣工人约定，工人工资按照实际劳动时间计算、按月发放，同时约定了每月应当支付的基本工资。受疫情影响，派遣工人2月份出工时间较短，计时工资未达到双方约定的基本工资。

对此，调解律师提出，本案中，工人工资是按月发放的，因疫情导致温岭公司停工时间并未超1个月，宁波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当月的基本工资。

此外，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的劳务派遣协议未对工人路费、餐费补贴支付问题作出明确规定。“宁波公司是劳务派遣公司，且之前曾与派遣工人口头约定，支付工人往返四川和浙江的路费和用工期间餐费补贴。”两位律师解释，“虽然只是口头约定，但不影响宁波公司履行支付工人路费、餐费补贴的义务”。

不过，受疫情影响，宁波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暂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相关补贴。工人拿不到工资和补贴不肯离开温岭公司，已经对温岭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。

为尽快解决资金来源问题，律师提出由温岭公司先行垫付，并最终促成三方达成合意：由温岭公司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和补贴，从温岭公司应支付给宁波公司的劳务派遣款项中予以扣除，不足部分由宁波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借款协议。随后，工人陆续返回原籍，一起群体讨薪纠纷就此化解。